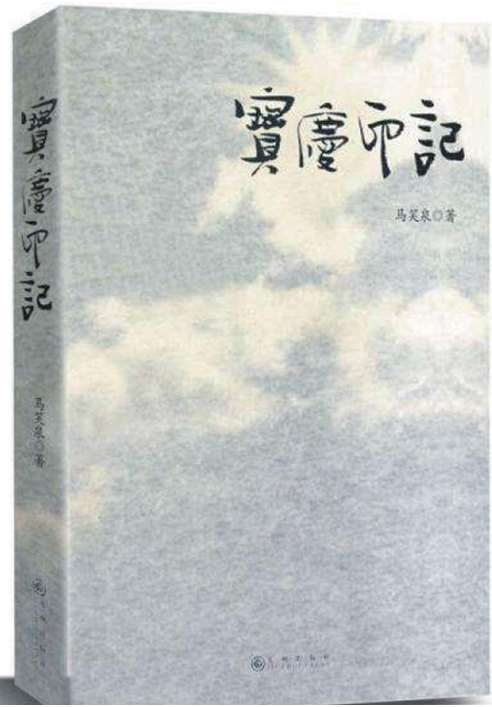


▲读者感悟

一部充满才情和骨力的美文集

——读马笑泉散文集《宝庆印记》

罗红英



《宝庆印记》(九州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是马笑泉老师的一本散文集,分为风物与人物两部分,共计21篇。全书以田野调查和史料钩沉等方式,对邵阳地区的历史、地理、人物、风俗、物产进行系统描绘,是一部充满才情和骨力的美文集,也是这个浮躁时代中一方沉静、厚重的文学家园。如同沈从文之于湘西、贾平凹之于商州、刘亮程之于新疆,皆属于棱角分明的地域散文。

马笑泉,1978年生于隆回,是属于将聪明大写在鬓角的那一类人。他虽然比我

清代文学家张潮《幽梦影》言:“花不可以无蝶,山不可以无泉,石不可以无苔,水不可以无藻,禾木不可以无藤萝,人不可以无癖。”我的癖好,就是静静徜徉在书海里。小时,家里穷,母亲把我的书放在一洁净的纸箱内,整齐有序,书脊朝上,不用时盖上,防灰尘落入,置于床下。那时家中老鼠猖獗,一日翻书,发现纸页被老鼠咬得如雪片,松软俨然似要做窝生子,我又气又恨又心疼,索性将纸箱置于床头,看它们怎样造次。

工作后,我一直租房住,只随身携带一些简单的行李,和几本常用的书。书都存于老家木箱内,每次回去,我都要翻箱倒柜寻书,找起来很麻烦,我决

▲书与人

心要做一书橱。正巧哥哥出差南方,归来捎回一竹子做的简易书架,上下分四层,古色古香,我特别欢喜。那时侄子正读初中,为增加他的阅读量,书让他代我保管。一次回家,发现书架空了不少,而哥哥家的餐桌上,床上以至地上扔的都是书,有的已破损。如此待书,我的心一下凉了半截。

我又用两个小木箱,把书重新装进封起,存于老家阁楼

小六岁,但至少比我老练十分。

在这个凡事都注重形式的年代,我第一眼就爱上了这部书不花哨的封面。颜色偏向于暗淡,以灰白色打底,配上几朵浅淡而自在的白云。这样的天空,属于记忆,属于家乡。这样广阔辽远的背景,适合于抒情,适合于存放最深厚最诚挚的感情。“宝庆印记”四个字用繁体书写,很沉静的黑色,待在封面吸人眼球,既古朴笨拙,又可爱大方。在厚重的乡情面前,任何一个鼎鼎大名都会自行收敛,变得小巧乖顺起来。马老师的名字,你若盯得久了,眼前会有一泓清泉欢欣地流淌,笑着跳着,奔向湛蓝的大海。同时会有一股力量磁铁般吸引着你,让你忍不住俯下身子,掬一捧溪水,去好好抚慰一下疲惫的心灵。

马老师的小说,是他想象性叙事中“再造现实”的强烈冲动,诗歌是他对世界的幽思、独白和瞬间观照。至于散文,满含着实证与思辨,他把它安放在离心脏最近的地方。所以,这些文字富含真诚,值得珍惜,因为它们是在悠长的岁月中慢慢攒下的,是一步一步在故乡的大地上踩出来的。

所以,每次在展卷而读时,我都会手执一笔,进行圈点批注。被我宠爱的,有极其生动优美的句子,如“临河的吊脚楼像段发黑的历史悬在那里”“有鸟鸣起落如珍珠在碧水中弹跳”;有随口吟出的诗歌,“透过露珠的眼睛/看我的故乡河之晨/太阳是湿的/像刚掰开的橙”“棒槌把月色捣得皎洁/给岸边的景物/穿上”;还有关于地理的纵

横与历史的深度……

跟着马老师娓娓的叙述,我重游了崑山、南山、云山与蔡锷故居,那些隐藏在时光深处的记忆又重新鲜活起来。更幸运的是,我虽在邵阳师范读了三年书,北塔、双清公园曾无缘相会,今有幸游玩,相信想象比实景更唯美。其他的如魏源故居、古田、法相岩、普照寺思义亭、武冈古城浪石古镇等,其静谧幽深,令人无限向往,如一道道小点心,勾引起心底的小馋虫咂嘴咂舌流口水。

“文有魏源,武有蔡锷。”马老师书中对这两位邵阳的大咖进行了生动的描绘。魏源乃晚清杰出的思想家,是邵阳文化的代表人物。放在全国的版图上摆一摆,所选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影响了当时的中国;放在世界版图上称一称,最有名的著作是《海国图志》,当时的情况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可惜了这魏源,是宰相之才幕僚命。再说蔡锷,这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天才人物,他吃得苦,霸得蛮,温文尔雅,沉默寡言。只有当言语成为一种行动时,他才愿意开口。这样的人一旦开口,历史就必须张开耳朵聆听,比如1915年爆发的护国战争。纵观其一生,可用诗人、革命家高君宇的两句话来形容:“生如闪电之耀亮,死如彗星之迅忽。”

捧着这本书,宛如邵阳稳稳立在我的掌上。

(作者系邵东县灵官殿镇石株桥铁塘中学教师)

总算有了名副其实的书房。新书橱做成一面墙,顶天立地,便于书类聚群分,更便于检索和运用。很喜欢一句话:“书是开在桌案上的花朵。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常常沉浸于书橱前,也许,人生奔波劳碌,只有文字,才使心灵安静而活泼吧。

古人称好读书,却不善于运用的人,为“书簏”或“书橱”。如今,很多人家的书橱作装饰用,放些真假古董,小艺术品,各种名酒等,即便放些精致的书,也是一种摆设。奇怪的是,凡真正以读书为业的书虫,其书橱大都比较简陋。大出版家范用先生,可能书太多的缘故,喜欢把书一叠一叠地摞起来,有坐拥书山之感。

▲新书赏析

20世纪的中国消费谱系

——读孙骁骥《购物凶猛:20世纪中国消费史》

禾刀

在《购物凶猛:20世纪中国消费史》(东方出版社2019年2月出版)一书中,常年致力于经济史研究的财经作家孙骁骥紧扣“消费”这一线索,从国家宏观和家族微观两种角度,讲述了20世纪中国购物和消费的历史演变。回顾中国百年消费史,是一个从闭塞落后、自给自足,到拥抱世界潮流的历史,是消费主义在中国“本土化”演进的历史,而每个消费者都是历史的见证者。

中国历史上对商业的抵触乃至抗拒根深蒂固,商人地位低下由来已久。及至晚清,虽有大量国人走出国门,但清廷祭出的改革举措更像是换汤不换药的敷衍。清末民初,伴随大量海外商品的涌入,传统手工业商品不堪一击。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就曾指出:“清末民初那种又白又细又软又廉的‘洋布’,彻底毁灭了我们已有三千多年的‘男耕女织’的传统经济体系。”

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激励国人奋发图强。面对如潮涌入的洋货,一些有过海外经历的商人率先迈开了脚步,努力琢磨适应新型商业规则。1900年,澳洲华侨马应彪在香港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现代百货公司——先施公司。为开风气之先河,马应彪妻子霍

庆棠还亲自披挂上阵,当起了女售货员。新中国改革开放后,经历长时间的物质匮乏,人们终于可以公开表白更高的消费目标。不过,在卖方市场牢牢占据主角地位,消费瓶颈并未完全突破,粮票、布票、肉票、油票等有着“第二货币”之称的各种票广泛存在,象征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投机倒把罪也直到1997年才取消。

孙骁骥指出,“人对于物质的种种消费欲求一旦进入现实社会,就必然会遭到种种现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的扭曲和限制”。回过头来看,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许多现象,在数十年前可能被视为“大不韪”。

消费主义的上一次萌芽始于清末民初。改革开放后,消费主义很快席卷神州大地。但消费主义的发展也带来了另一个次生问题,那就是越来越多家庭采购的商品,真正的使用率并不高,这也成为孕育“断舍离”观念的沃土。

改革开放前,民间包括商人自身对广告也不甚“感冒”,许多人“视广告为经商的旁门左道。中国传统生意人信奉‘酒香不怕巷子深’‘良贾深藏若虚’等信条”。直到1979年1月,上海电视台才播出了中国大陆的第一条商业广告。

广告不仅仅是广而告之那么简单。法

国社会学家罗兰·巴特曾指出:“广告的本质是一种符号,而用这些符号编织而成的网络所传递给消费者的信息都‘蕴含了如此众多的社会的、道德的、意识形态的价值’。”所以,孙骁骥说:“消费主义是何种渠道进入并改造了普通人的生活的呢?最直接的渠道是大众媒体和广告。”

随着改革开放逐渐进入深水区,过去的卖方市场逐渐过渡到买方市场。当年曾神气十足的商品,逐渐弯下腰杆,想尽千方百计寻求消费者的接受认同。1995年,一个叫王海的人突然跃上媒体的头版。这位看似故意给商家“挑刺”的年轻人甫一出现便在社会上招致两种针锋相对的声音。作为商家一方当然会指责王海知假买假,居心叵测。放在消费者眼里,如果没有这种“挑刺”的精神,许多消费者上当后因嫌麻烦,常常只得忍气吞声,自认倒霉。随着消费者自我保护权益的觉醒,相关保护机制的日臻完善,过去那些靠“一锤子买卖”的伪劣商品无一例外被淘汰出局,各地“假货一条街”关的关,停的停,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知名品牌商品的攻城掠地。

改革开放后,中国消费市场呈几何式增长。从2008年至2017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0.8万亿元人民币增长为36.6万亿元人民币。有国际机构的预测更加乐观:中国将在未来10年左右迎来消费的“黄金期”,到2020年,中国的消费将占全世界总量的12%。

可以肯定的是,消费的快速增长既折射出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也折射出市场体系的日臻完善。



▲文本细读

用悲悯的情怀洞察时代

——读余华散文集《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

荆墨

喜欢余华,不仅仅因为他的小说,更因为他的先锋意识。作为上世纪80年代先锋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余华曾写出《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惊世骇俗的小说。而这本散文集《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余华以戏谑的文笔戳穿生活表象,再论人生与自我。

全书分为“一个记忆回来了”“文学·音乐·旅行”“活着,为了讲述”三章,医院里的童年、高考记忆、第一份工作、第一次看电影、与儿子的种种温情片段……一个个记忆从余华的脑海中闪现。这里,有对往事的追忆与深思,对文学和音乐的独到见解,旅行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以及对整个社会和历史的反省。正如余华所说:“这就是我的写作,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出发,经过政治、历史、经济、社会、文化、情感、欲望、隐私等等,然后再回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余华是个叙事高手,总能以最简单的文字,最平和的语调,简单、直接、有力地把读者带入故事之中,与主人公同呼吸、共命运。在开篇《一个记忆回来了》一文中,余华写到他在浙江海盐度过的最初的岁月。就大环境而言,余华成长于“文革”时期,曾在这座小城镇里目睹过种种荒诞的场景。余华的父母都是医生,他一放学就往医院跑,见惯了父亲刚做完手术双手沾染鲜血的样子,听惯了失去亲友的人们歇斯底里的哭喊声。

余华回应了自己写作风格的转变。他在书中写到,“为什么我在上世纪80年代的短篇小说里有那么多血腥暴力,为什么到了90年代的长篇小说里,这个趋势明显减少了。”原来,所谓文风的改变源于他做的一个梦。如他所说:“有时候,人生和写作其实很简单,一个梦,让一个记忆回来了,然后一切都改变了。”

如果说幼年的经历对余华产生了影响,那么一众文学大师则对他的创作起到了极大的启发和推动作用。川端康成、卡夫卡、博尔赫斯、三岛由纪夫,这些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都是余华文学道路上的灯塔。余华结合自己多年的创作经验,跟随自己的性格另辟出一条蹊径,把模糊抽象的文学本质具象化、生动化、立体化。对于阅读,余华建议,要去读伟大的作品,不要去读平庸的作品。余华说:“长期读伟大作品的人,趣味和修养就会很高,写作的时候自然会用很高的标准要求自己。”读之,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这些大师,有豁然开朗,相见恨晚之感。

余华剖析了日常生活表象下隐藏的社会病灶,对所处的时代进行由外而内深刻反省。比如在《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一文中,余华以六一儿童节的一个新闻报道为例,一个北京的小男孩想要的礼物是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而一个西北小女孩则羞怯地希望得到一双白球鞋。对此,余华写到,两个孩子梦想之间的差距,显示了两个极端。历史的差距让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欧洲四百多年的动荡万变,而现实的差距又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去了。这就是今天的中国,我们不仅生活在现实和历史的巨大差距里,也生活在梦想的巨大差距里。

余华在作品的叙事中藏着悲天悯人的情怀,但一切描写都是那样的不露声色。在书中,余华坦承:“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也没有一个人生是可以替代的,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着只属于自己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只来世间一遭,生活一次,每一种生活都弥足珍贵,要好好珍惜。可见余华对生活是充满热爱和热情的,态度是积极的。即使他早期那些充满血腥和暴力的作品,也无不是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事物所活着,这是余华在写作中逐渐明白的道理。

音乐给了余华爱的思想,从而影响了他的文学观念;音乐影响了他感知世界的方式,从而导致他叙事风格的变化。在余华看来,音乐的叙述和文学的叙述,都暗示了时间的衰老和时间的新生;它们都经历了情感的跌宕起伏,高潮的推出和结束时的回响。音乐中的强弱,如同文学中的浓淡之分;音乐中的和声,就像文学中多层次的对话和描写;音乐中的华彩段,就像文学中富丽堂皇的排比句。不同的是,文学的道路仿佛是在地上延续,而音乐的道路更像是在空中伸展。余华用别只眼看音乐,看出了和常人不同的感觉。

余华曾说过:“任何时代,都有不浮躁的读者。读书是一个安静下来才做的事。”无论如何,在面对中国当下的现实时,余华没有闭上眼睛,没有背过身去,而是用悲悯的情怀洞察时代。对于余华和其作品,我们的情怀还在,热爱还在,庆幸的是,余华对他的创作也同样保有最初的情怀和热爱!